

2017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围观改变中国？——互联网书写与中国式公共领域的特质

HAVE ONLOOKERS CHANGED CHINA?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WRITING AND
THE CHINESE-STYLE PUBLIC SPHERE

Tang Xiaobing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围观改变中国？
——互联网书写与中国式公共领域的特质
Have Onlookers Changed China?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Writing and the Chinese-style Public Sphere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
Tang Xiaob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icro-blog (微博) writing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public sphere. Many public intellectuals engage in this new form of public expression and hope it can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ushing China to mak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ublic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micro-blog writing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debate and play a political role in public life, many scholars come to different judgments and conclusions.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active micro-blog authors in China are a small part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not representative enough. The appearance of Wechat (微信) culture and oppre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have rapidly weakened micro-blog writing culture.

一、引言

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生产方式、存在形态和传播效果，也对当代中国知识人的言说方式、身份认同，以及知识人与大众、政治体制之关系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纵观从 2000 年前后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以后，从 BBS 的兴盛（比如天涯社区的各种论坛、各种小型的讨论社区比如“思想的境界”等网站），到 2003 年前后形成一定规模的世纪中国网站（当时中国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网站，包括主页和各种论坛比如“世纪沙龙”、“世纪书斋”等，这个网站聚集了许纪霖、刘擎、罗岗、倪伟、王晓渔、任晓雯等 50 后、60 后、70 后的知识群体，在政治光谱上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但也吸纳了相当数量的新左派知识分子，2006 年夏天被关闭），与之同时存在的大型思想文化网站有依托北京大学的“燕南社区”、选举与治理网、凯迪社区等。在这段中国知识人的互联网蜜月期，各种虚拟空间进行了相当有深度且多元的讨论，并且以网络为媒介，以突发事件为契机，形成了相当有成效的知识分子合力，比如 2003 年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某收容所殴打致死事件，就是以网络上的持续发酵、知识分子的深度介入造成民意压力，而达成了违反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结果。

当各种论坛因为政治因素或其他因素先后消逝或衰落之后，一个更加个人性的互联网书写形式崛起了，这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博客写作。相当多的知识人被吸引到这个“自媒体”的舞台之上发布文章，与网友进行一对多的讨论。博客提供的好友链接等形式，也在强化知识社群相互之间的连带感，并给网友提供认知博主的知识地图。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博客中国网、新浪博客等。博客提供了比传统媒体写作更宽泛的自由度和多元的话题，因此反过来可能倒逼中国传统媒体更开放。相对而言，博客写作带有更多的私人化色彩，从而也是互联网写作多元化的一个契机，举凡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旅行、交际、修行、情感等各种议题都可以在博

客上得到表达，博客所形成的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网络社区。但是这种形式也在之后的微博革命中被迅速放弃，一种更加个人化、字数限制在 140 字以内的微型博客一夜之间就差点将博客形式给淘汰了。微博显然是对西方国家的推特（twitter）的某种模仿，但其形式和功能又不同于推特，微博因为转发、评论、快捷，实名认证的名人效应、粉丝数的即时呈现，微博大 V 认证带来的强烈的身份感，完全以博主为中心、以粉丝为受众的交往结构，迅速吸引了中国知识人的兴趣。它所带来的似乎是一种交往无边界、言论无禁区的极限体验，具有突出的资讯传播功能、话题生产能力以及给体制形成民意压力的功能，一些大 V 的粉丝数量动辄数十万甚至几百万上千万，远远超出一般性报刊的读者数量，如果就传播力而言，微博显然超出了博客。但我们也应该对于微博大户的“僵尸粉”现象给予注意，商业主义的逻辑以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的方式呈现，对一些在传统媒体和公共生活中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商界领袖和影视明星等，新浪、腾讯微博等划拨粉丝数以扩大其影响，而一些人士为了自身在网络上的知名度，更会付费购买“粉丝”，这就导致中国互联网上的“人气”成为一个需要谨慎评估的指数。网络影响力超过传统媒体，只是不规范的媒介市场竞争中前者的一个策略性口号而已，微博的影响力最终超越了传统媒体，依靠的是微博上的公民个人的具体实践，以及一些重大公共事件激发的契机，而不是依靠那些大 V 的粉丝数。

就在微博方兴未艾之时，腾讯推出的微信与手机阅读绑定，通过朋友圈、微信群、订阅号、微信公众账号等形式，迅速地将当代中国追逐互联网阅读新潮流的读者吸纳过去，而微信推出之时，也正好是新浪微博等遭遇当局打击大 V（比如以私人生活理由逮捕商界名人薛蛮子等）而呈现普遍萧条之际。微信的阅读抵达率更高于微博，各种传统媒体也纷纷推出微信公众账号，比如上海的《东方早报》、北京的《东方历史评论》等。此外，一些大型思想文化网站也推出各种微信订阅号比如共识网¹、腾讯网²等。微信可以贴出图片、阅读链接和分享，可以形成更加私人化的朋友圈，有效阻止了陌生网友的进入，为很多更加习惯中国式交往方式的网友提供了方便。当然，这也是微博在盛极一时时遭遇政治力量的打压（主要是打击传播力较强的大 V 微博主），微信似乎迅速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安全感的言论社群和交往空间。自然，中国互联网写作也并非如上文所述，是一个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单向度进程，而是形成了多种媒介形式并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某种传播形式占据主导型地位的特殊格局。具体而言，比如在当下中国，最早的天涯社区仍然存在，只是人气萧条，博客也仍旧存在，只是半死不活，微博在国内外出现重大事件时（比如最近的马来西亚航空失事事件，微信上谣言满天飞，而微博作为自媒体具有信息自我净化功能，让很多一度转移阵地到微信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微博相对于微信的媒体属性），仍旧会焕发生命力，从微信用户吸引回一些用户群体，因为微信相对于微博而言，更加私人化也因此而更不具有自媒体的属性和特质（本文将另辟一节单独讨论微博与微信的异同）。但从代际更替来看，互联网写作的不同形式确实呈现出了一种时间上的先后更替现象，比如当代中国 90 后的年轻知识分子就几乎没人再使用博客等形式，当然更几乎无人阅读传统的纸质报刊，阅读终端完全被时代潮流所牵引。此外，就知识群体共同认可的大型思想文化网站而言，这几年迅速崛起的共识网（依托于《领导者》杂志）成为中国左中右乃至儒家、基督教派等各种知识社群都会阅读的网站，其以思想文化和具有公共性的学术文章见长，以包容量大、信息更替迅速、多元立场等成为当代中国乃至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同时创办了共识读书会、共识在线访谈（经常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谈热点话题，比如请许纪霖教授谈中国知识界与牛津共识、徐友渔教授谈“牛津共识、新左翼与当代思想问题”，请香

¹ <http://www.21ccom.net/>

² <http://www.qq.com/>

港作家陈冠中谈“新左翼思潮的图景”，请清华大学青年学者吴强谈“台湾学运与民主抗争的底线”等，可以说将相关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与当代知识公众关切的话题实现了有深度的对接，从而深化公共领域对这些议题的认知水准和讨论层次)、共识人物评选等活动。

二、微博与中国式的公共领域

无论是从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有效度而言，微博都是最值得作为一种特殊的互联网形式，来观察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构成、动力及其限制。互联网写作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在互联网从事公共写作的知识社群却存在一定的延续性，有一些是从传统媒体扩展表达空间而转移到网络，另外一些知识人则是同时使用传统媒体与网络写作两种形式的，还有一些作者则是依托于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人，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被传统媒体吸收，就当下互联网写作的原创性而言，腾讯网大家专栏可以说吸纳了比较好的一个作者群体，既有多元化的知识背景和社会构成，同时又有足够强的话题生产能力和现实感，而且这些作者往往对互联网读者所期待的新型表达方式比较熟悉，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媒体的“说教”式的表述方式，而熟练使用讲述故事或公共说理的方式。这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有闲的文化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知识品质、行动逻辑和政治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价值观念，因此，也特别值得给以注意。

微博出现以后，形成一股强大的热潮，一时之间，神州大地人人谈微博，写微博，转微博，微博成为知识界和公众社会的时尚。微博在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微博打拐、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中国红十字会与郭美美事件等公共事件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要么是呈现了被主流媒体刻意遮掩的现实，要么对一些公共权力机构的运作机制表达了质疑，强化分散化的公民之间的横向连带感，形成了网络空间里的强有力的虚拟社群。在这些持续发酵的微博围观政治之后，连中国知识分子报纸的代表《南方周末》都发表著名报人笑蜀的评论文章《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高度肯定了网络舆论的价值：“一个公共舆论场早已经在中國着陆，汇聚着巨量的民间意见，整合着巨量的民间智力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让亿万人同时参与，让亿万人默默做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即一个可以让良知默默地、和平地、渐进地起作用的空间。每次鼠标点击都是一个响亮的鼓点，这鼓点正从四面八方传来，汇成我们时代最壮观的交响。”³

究竟应该如何评判微博在当代中国公共领域能够发挥的作用之限度，这也成为微博的认同者与质疑者之间深刻的分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微博本质上是‘个人媒体’，是个人向社会喊话和向社会表达的工具，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场域的围观结构，这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和意见表达的均衡性与多元化，建构了对于真相追逐的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促进社会民主开放和健康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⁴微博被赋予了相当正面的理解，是促进社会多元化和平衡的工具，并且微博是链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媒介，而非直接面对政治力量的表达空间。但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看来，微博所释放的社会力量也许仅仅是昙花一现，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一场关于“微博、政治公共空间与中国的发展”中指出：“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约束，人的关系、礼仪、文明，都可以不讲；另一方面，特别容易被来自网络公司、金钱和行政权威操纵。微博特别不容易形成权威，我骂你就骂你了。在微博上，有些人类似文革时候的红卫兵，想打谁就打谁，见‘伟人’

³ 笑蜀：《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南方周末》，2010年1月14日。

⁴ 喻国明：《微博是个好东西》，<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hpl/2012/0410/57283.html>

就下跪，微博上的‘伟人’可以是网络公司，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权力，我们都不知道。在微博中，谁都可能是‘红卫兵’，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⁵微博上的个人成了虚拟空间里的原子化个人，缺乏熟人社会的规则约束，一方面似乎特别彰显个性追求自由，同时却对知识偶像或者说意见领袖有着极为狂热的崇拜。赵鼎新准确地指出了微博用户心态的悖论性，即一种反权威的追星式粉丝文化，这种心态对于公共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也有待于一种更长期的跟踪观察。

就当代中国的微博发展而言，其所呈现出的一些复杂光谱，其实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公共领域的契机⁶，大致而言，可以从微博的草根性与精英性（也就是所谓代表性问题）、微博的公共说理功能、微博的政治功能（民主化）与政治限制等方面展开。

（一） 微博用户的代表性

微博是否真正有效地拓展了普通民众的言论空间？微博是否拓展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和孕育了公民的政治意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微博言论所体现的“民意”？众所周知，在微博空间上，往往是极端、偏激、挑衅式的言论和信息会迅速被关注、转发和评论，并吸引传统媒体之注意。当民意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制度化的管道得到有效表达的时候，微博提供了一种虚拟空间的表达可能性，被现实政治权力挤压的声音便可能变形为一种反体制、反政府的言论。许纪霖在微博刚刚兴起时，曾经组织了一场以“微博与公民社会”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会上他指出：“微博所代表的民意，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和民粹之间是什么关系？这种微博上所形成的民意不是一种被代表的民意而是一种直接被呈现的民意，它会不会形成一个网络的民粹主义呢？”⁷他所担忧的是微博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传播力，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民意对理性力量的裹挟。换言之，也就是网络上的“多数人暴政”，因为微博上的实名者或匿名者天然就代表着“民众”或者说“群众”，而民众的利益直接被等同于公共利益，而民众的反抗更是被赋予了天然的正义和悲情。所以，在看上去似乎享有相对言论自由的网络空间，可以批评政府，而不能批评民众，否则就是网络上的“政治不正确”。而来自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张涛甫教授则认为微博消解了精英与民众之间在表达权上的鸿沟，使得平等交流成为一种现实：“微博作为一个高度草根化的社会媒介，具有天然的亲社会性。在微博空间，平等是传播的信用卡，互动是沟通的通行证。传者与受者的交流互动不再依附于等级化的世俗传播权力，而是依靠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这要求沟通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平等的、人性化的。”⁸这显然是对微博空间的一种过度浪漫化和理想化的想象，与微博事实上的运作逻辑和权力格局存在差异。

曾繁旭、黄广生对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个案研究发现，互联网并非如预设的那般，在任何议题中都成为底层表达的渠道，其研究显示，网络上的议题关注度和意见领袖息息相关。依托于各种新媒体平台，意见领袖已经形成了虚拟的线上社区，这一社区在驱动公众参与和推动政策回应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根据他们的案例研究，公共议题能够受到关注关键在于互联网上的表达是否嵌入到意见领袖社区中。互联网上的“喃喃自语”只有进入意见领袖的社区之中，

⁵ 赵鼎新：《微博、政治公共空间与中国的发展》，《东方早报》，2012年4月26日。

⁶ 限于本文主要讨论微博所彰显的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特质，因此对于微博所扮演的其他角色，比如日常生活世界的展示，情感社群的建立等不作讨论，事实上，微博之所以风靡一时，并不仅仅因为其高度的政治性，而是因其广泛的多元性，这种公共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逻辑关联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⁷ 许纪霖等：《微博与公民社会》，《南风窗》，2011年第9期。

⁸ 张涛甫：《微博一小步，党报一大步》，《东方早报》，2012年7月31日。

才能上升为公共表达，进而引起公共舆论的关注，出现政策回应的可能。⁹在网络的平等表象之后，其实仍然存在微博用户的公众影响力之区别，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微博等新媒体提供的表达空间对于普通人就没有实质性意义，学习面向公众社会进行表达本身就有积极的意义。从微博用户的社会构成来看，工人、农民、农民工甚至一些中产阶级都并非微博用户，或者并非微博上的活跃用户，活跃在微博上的主要是知识阶层和学生群体。

从 20 世纪中国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历史来看，微博作为一种网络言论空间，同样承载着中国式公共领域的特质。一方面，微博上弥漫着强烈的反权威主义、反精英主义的民粹化色彩，这种价值观念又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仇精英的集体心态结合了起来，从而导致微博成为公民表达现实不满和愤懑的主要渠道。这种反精英主义的公共文化，自然与 20 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留下的政治传统息息相关，后者正是在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之中全面摧毁了维系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商人阶层等，以弱者、底层的名义赋予了所有反抗强者和社会主流的行为、言论以道德上的正当性。微博用户恰恰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挪用这种历史遗产而为自身的权利呼吁。另一方面，微博形成的所谓粉丝文化、大 V 崇拜等，又在彰显一种另类的人格依附型文化。尤其是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如于建嵘、张鸣、贺卫方等人拥有的崇高声望，似乎让微博实现了“一言可以兴邦，一眼可以丧邦”的言论理想。究其实质而言，微博之所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言论广场，并形成知识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聚集效应，又充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意识和文化情怀，并未完全被革命政治所摧毁，普通民众仍旧对知识人怀着期待，就此而言，微博政治又在彰显着中国古老的士大夫政治传统，只是更换了一种形式登上了公共领域的舞台。因此，当代中国的微博空间在精英与反精英、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性格。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所谓代表性问题，微博言论究竟是代表着中国社会多数人的意见和态度，还是仅仅是一小群知识阶层和愤青的声音，或者说即使微博用户在人数上并不占据优势，但确实呈现出了当代中国的公共利益，因此也以“少数人”的比例而代表着最大多数人应该表达出来的利益。换言之，微博、博客等互联网上的新媒体形式，是创造了一种强化国家与公民、政党与群众之间的新的互动模式，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党国体制的“代表性断裂”问题¹⁰，还是进一步在强化民众对党国体制的离心力，从而导致代表性危机日益严重？这是我们在思考微博等新媒体的代议功能时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核心问题。

（二）微博的公共讨论功能¹¹

与微博的精英性、草根性紧密关联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微博是否在有效地提升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品质，最要紧的就是微博是否在推动公共舆论的讨论水准，字数限制在 140 字以内的微博是否具有说理的功能。20 世纪下半叶以降，中国人的公共生活高度政治化，而其公共辩论更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比如文革时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党报体语言和思维对于公共生活自然是一种毒害，限制了公共说理文化的形成。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有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日常语言和公共语言也有一个向理性、文明的表达缓慢回归的过程，但中间仍旧留着过去时代的烙印¹²。互联网写作兴起之后，我们才逐渐看到一种自由、

⁹ 曾繁旭、黄广生：《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开放时代》，2012 年第 4 期。

¹⁰ 可参阅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 年第 2 期。

¹¹ 研究网络流行语与公共文化的李明洁教授认为微博对公共性之贡献可能更多是引发话题，而不是展开讨论。这受限于话语的交流形式，所以，其不善说理是非常正常的。

¹² 关于这一主题，可参阅笔者拙文：《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南风窗》，2014 年第 8 期。

开放、个人化的表达方式的诞生和兴盛。交流的对等性和平等性取代了此前居高临下的说教文风，公共生活的丰富与心智生命的多元化呈现良性互动。但是，微博这种特殊的文体，以及微博所提供的言论广场的独特性，导致互联网写作者的表达方式出现了一种自我扭曲甚至变异，爆粗口、过度简化、站队、大批判、诛心之论、阴谋论等各种形式都在微博上呈现，语不惊人死不休，话不投机半句多，对话语的传播效果的追逐，已经湮没了对公共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兴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微博催生了“自我的双重化”，即微博呈现的公共自我，与微博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私人自我，可能是高度分裂性，一个谦谦君子可能是一个微博上的恶俗分子，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顺从体制逻辑的人，却可能是微博上高调反体制的人。这种自我的双重性甚至分裂感，会对于当代公共领域的发展造成何种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长期关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说理文化的旅美学者徐贲很担忧地指出¹³，当今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敌意，使得正常的说理变得根本没有可能。敌对战线是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这是他们射向对方的“枪炮子弹”，一方用的是“西奴”、“汉奸”、“美狗”，另一方用的是“五毛”、“脑残”、“文革余孽”。这两条战线之间只有交火，没有说理对话。粗暴、仇恨、武断和不宽容已经成为缺乏善意的战斗型互联网话语特征。大体而言，活跃在微博上并关注公共事件的主要是两个知识社群，一派主要由接受了西式民主自由观念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成，这也是拥有最多粉丝的阵营。另一阵营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被称为新左派，其领袖人物有言辞锋利的染香，另外还有司马南。这一阵营的博主相对来说更加同情政府，但是也未必一定支持政府，更多地是试图为维护政府统治而修补漏洞，同时坚定地抨击自由主义阵营尝试引入西方普世价值和民主体制的努力。自由主义阵营将新左派阵营蔑称为“五毛党”，作为回应，新左派阵营蔑称自由主义阵营为“带路党”。¹⁴可以说，污名化、妖魔化的符号暴力，充斥在微博话语上，尤其当公众事件涉及到大众偶像的时候。比如韩寒代笔门事件发生后，围绕挺韩和倒韩，在微博等几乎所有的网络社区都爆发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撕裂了自由主义知识社群，并同时导致公众对一些拥有广泛读者却一直“挺韩”的媒体产生质疑。立场先行，站队优先，表态泛滥，都在矮化微博空间上公共讨论的水准，以至于一些微博观察者提出：微博争论究竟是助长了公共理性，改善了公共生活，还是在不断地恶化公共讨论和强化了族群分裂？

微博是否是一个可以说理的空间，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态度。徐贲认为，“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理是一种形成公共群体的力量，它形成的是一个人们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都认同理性话语伦理的公共群体。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纸刊物最适合于说理。微博不同，它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气相求的性质。……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方能得以传播。结果便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起到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¹⁵在理性与情感之间，徐贲偏向于认为微博不能支持一种严肃的公共讨论文化的形成，而持续发酵的情感，表面上看似象征着民意的高涨，但往往是一种非理性的公共表达。但也有学者根据密尔的思想自由市场的理论，认为微博具有一种自我澄清的净化功能，即使是一些虚假信息和谣言，也会在信息和言论广场上被迅速证伪。这种面对多重信息进行去伪存真的批判性思考，恰恰可以培育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理性。

¹³ 可参阅徐贲近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¹⁴ 童燕齐、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1、2期合编本。

¹⁵ 徐贲：《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南方周末》，2011年12月1日。

张涛甫就认为：“对于微博上的偏激言论，总体上应当持宽容的态度。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公民高度参与的社会，作为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的个人而言，其公开表达的内容不完善、有错误甚至很偏激都是非常正常的。实际上，在网上，个人的错误表达、偏激言论很容易被‘大数定律’所抵消，如果表达和辩论能够保持自由和畅通，偏激或错误的言论一般不会有生存空间，它们很容易被发现和纠正。”¹⁶

笔者在研究近代中国《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形成的公共舆论时曾经指出：“学术共同体的发达，未必一定会推促公共舆论的强劲，但若没有学术共同体的支撑，尤其是知识资源上的贡献，公共舆论往往容易陷溺在单一性话语的自我循环之中，而无法开创出新的认知视野与批判能量。”¹⁷回顾今日中国的微博言论，这一结论仍旧适用，但是今天中国的主流知识界与民国时期的知识界有着较大的差别，民国时期胡适、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等人不会觉得专业与公共、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他们既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同时也积极地创造和参与当时的公共生活。可是，今天中国大学知识人的主流是“体制化”，即按照项目、课题指南等引导性的内容，来设计自身的研究主题和职业生涯，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参与公共生活，也不关心公共生活品质的提升，整个大学弥漫着一种被金钱和权力宰制后的狭隘和平庸的气味¹⁸。与此同时，一些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人，在获得世俗名声之后沾沾自喜，顾盼自雄，在公共舆论中已经缺乏自我知识更新和观念批判的能力，最后往往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式方式在思考和表达，这样自然很难促进公共讨论的多元化和理性化，也就影响公共舆论的品质。¹⁹

（三） 微博的政治功能

微博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被寄予厚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政治功能，也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对不公不义现象的揭露、对真相的接力调查等功能，这在郭美美炫富与中国红十字会、“我爸是李刚”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等都有不俗的表现。陈志武对微博的政治功能持相当正面的评价：“第一，微博使得下级部门以往的欺上瞒下行为更加困难，使上级领导更能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降低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第二，微博使行政权力体系内的腐败行为更加艰难，因为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第三，微博带来的信息流畅，使中国公民对社会更了解，这会提升社会理智，有利于良序社会的建立。”²⁰积极而言，微博展现了当代中国公共领域里的公民议政、问政意识的觉醒。政治不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他人之事，而成为日常生活中必须给以思考、判断和行动的事情，在这种微博议政的浪潮中，原来分散的个人仿

¹⁶ 张涛甫：《微博一小步，党报一大步》，《东方早报》，2012年7月31日

¹⁷ 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¹⁸ 可阅读笔者近著《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的相关论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¹⁹ 知名评论人士彭晓芸在对此文的回应中指出，今天中国知识界与民国时期最大的差别，不在于知识分子自身品格的差异，而在于商业主义对知识分子实现的控制力，譬如，新浪捧谁不捧谁，给谁送粉丝，资本的权力可是极其巨大的，也包括媒体，媒体让谁上封面，炒作包装哪个公知，都极大地限制着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沾沾自喜，沽名钓誉，主要就是因为“商业主义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媒体生产出来的伪知识分子，媒体吸引眼球的行业属性注定筛选出这样一种品格的“公知”来。不沾沾自喜，不依附媒体，够独立的知识分子，往往被媒体边缘化。因此，今天并不缺胡适傅斯年这一类水准的人，而是媒体筛选机制过于强大，而学术共同体太弱势，社会公众又对知识分子太隔膜，缺乏判断力，容易不加甄别地接受媒体的喂养。“韩寒现象”就是商业主义大潮的典型，有没有学术功底不再重要，而是会不会包装才成为了能否“浮出水面”的条件。感谢彭晓芸基于其专业背景和言论实践基础上的回应。

²⁰ 徐伟、方考飞：《微博意见领袖“围观”中国》，《时代周报》第106期。

佛获得了一种内聚的动力，成为一个网络上公民式的“想象共同体”。这种现象，放置在 1990 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去政治化的社会背景来看，尤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很显然，微博言论和立场，往往是与传统媒体互动之后才获得更大的政治能量，这种能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管控，所以观测微博言论的演变轨迹，不能只分析微博言论自身，而应该结合时政、国际局势等多种因素。当局对待微博也并非一味放松或收紧，而是依时而动收放自如。微博领域呈现出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博弈、妥协的轨迹。

在一个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下的中国式公共生活中，微博用户到底能够在朝向民主宪政的政治目标走多远？尤其是在微博曾经的热闹因为受到打压而迅即萧条时，人们开始怀疑这种纯粹立足网络而与个体日常生活并不紧密相连的微博文化，究竟是一种虚拟性的围观政治还是有可能向现实政治转化的大众能量？独立知名评论人彭晓芸认为，在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像和视频数据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络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络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一下这样一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像头、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一次次可被实现的公民政治广播，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彭晓芸对微博政治的社会效果也持一种相当正面的评估，她认为在网络社会运动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因此，不能再把网络社会运动仅仅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²¹

微博的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网络维权和线下维权结合的形式来展现的，这种政治功能主要是以舆论监督、民意压力等形式呈现，而微博维权往往也是针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个案，甚至有时候都是援引法律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来进行。因此可见，微博维权往往在抽象的意义上并不挑战当下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是针对具体事例在表达抗议和维护权利。政府部门也是通过对微博舆论的回应和及时解决相应事件，也就是通过提升社会治理的透明、公开和有效性来进一步强化政治的合法性。当然，我并不是认定具体的维权与根本性的质疑之间一定不会形成某种关联性，可是从当下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来看，微博维权的言论和行动往往被体制有效地吸纳，而那些异议者的声音也被一再地从网络上清除。藏雷振在一项关于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互联网带来海量的政治信息与中国低水平的政治参与不成比例。这说明，互联网对中国民众具有不同的意义，也验证了之前理论探索中互联网对政治行为影响的积极意义，即当前新媒体的普遍使用提升了公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并使政府对信息控制能力降低。……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兴起带来政治信息多样化，以及公民对信息的可选择性，也提供了传授和学习政治创新性路径。互联网时代的媒体被喻为传送带，将政治精英的观点传送给大众，促进现代政治人成长。但这种积极的意义在中国政府呈现对互联网功能的极强适应性面前，又变得极为暗淡。”²²从微博来看，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在政治功能（包括信息获取和政治动员、政治异议等）上的双重性。

围观改变中国，曾经是微博盛极一时时触动人心的口号。甚至连长期观察中国社会的日本作家加藤嘉一都对此持相当乐观的态度：“长远地看，微博一定推动中国的民主。微博在动车追

²¹ 彭晓芸：《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台北：《旺报》，2011年7月31日。

²² 藏雷振：《互联网使用影响政治参与吗？——研究观点、分析路径及中国实证》，《研究报告》总第82号，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2014年4月。

尾、违法拆迁、政府腐败、诚信缺失等公共事件面前的追踪报道中，政府早就变成了弱势群体，官方正在试图把极为被动的局面扭转为相对主动。民间的想象力与智慧正在迫使威权政府感到健康的压力，从而产生改革的动力，最终深化社会的活力。中国政府原来在公共话语体系上把握着太多权力，微博则有可能使它回归相对正常的抗衡途径。”²³可是从当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和公共领域来看，围观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往往还是取决于政府部门的回应，它缺乏一个制度性的管道来持续地施加压力。考察微博上的言论与心态，网友中的多数往往将“围观”当作了“政治实践”，以为如此就完成了公民的责任。最后导致一种韦伯所言的不面对政治后果的亢奋，这种微博心态常常是激情有余，而没有冷静心态和判断力²⁴。换言之，微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结语：从微博到微信：公共性的危机？

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相对于公共领域的多重含义，‘私人’这个词从它原初的‘被剥夺’意味上获得了意义。过一种完全私人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对一种真正人的生活来说本质重要的东西：被剥夺了从被他人看到和听到中产生的实在性；被剥夺了一种在一个共同事物世界的媒介下形成的，使人们彼此既联系又分离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赢得某种比生命本身更长久的事物的机会。”²⁵就当代中国的六十余年历史而言，前三十年是私人生活领域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每个人都被迫卷入政治生活之中而无暇无能保护一己之私人空间；而1980年代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并行不悖发展的历史时期，私人生活日趋多元化，而公共空间则逐步走向开放；1989年以降，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刻意引导之下，政治表达空间严重萎缩，公共言论遭受压抑，而社会经济和私人生活空间则被极度放大，这20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最主要的一个趋向就是“去政治化”。互联网表达空间的出现，相当程度上逆转了这种日益恶化的趋势，公民的表达意愿再度被激活，而公民的表达能力也在公共舆论的锤炼中得到训练和自我训练。假以时日，互联网很可能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重建当代中国公共性的最重要的媒介。中国以互联网为表达平台的公共领域呈现出反精英又高度依赖精英、追求平等表达权却又呈现出言论的等级化、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却又匮乏韦伯所言的“切事”的政治能力（或者说政治成熟）的特质。

遗憾的是：政治力量的严厉管控，导致盛极一时的微博舆论力量急剧衰退，网民对互联网的公共书写也一时意兴阑珊。此时此刻，腾讯网推出的微信迅速吸引了网民，网民中的主体阶层迅速被微信席卷而去。微信因其手机阅读的方便、发送信息的抵达率和回馈、网络发言的安全性、与私人交往网络的对接、分享长文、图片等便利、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多元化、整体气氛的“去政治化”，获得网民的认可，似乎也更适合将公共生活私人化的中国人的心灵习性。显然，与微博相比较，微信更具有社交媒体的属性，而微博更具有自媒体的属性，前者更倾向于私密化的交往方式，而后者更倾向于言论广场的公共交往。就两者特质而言，微博属于圈外交际，面对的陌生人与熟人兼而有之的受众，是升级版的传统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与开放性，而微信属于圈内交际，大多是熟人社会网络在微信上的复制，微信上的回应、评论更多是依赖熟人圈的交际原则进行，比如人情、面子、相互性等。就两者用语而言，微博语言显然

²³ 加藤嘉一：《微博能推动民主吗？》，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11月23日。

²⁴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²⁵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更正式一点，也更偏向于政治化的表达，因而具有“愤青”特质，而微信用语更私人化和随意，文艺小清新的气味较浓，也较有人情味，因此可以说前者的表达更富有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后者的表达更富有情感功能和交际功能。当然，微信后来推出了公众账号和全文阅读等功能，也导致微信在多元化和专业化，这对于微信群体会产生何种影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²⁶。总而言之，从微博的独领风骚到微信的一枝独秀，似乎呈现了当代中国以网络为主要平台的公共性的危机，即一种从公共生活退出转向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的趋势，这既来自体制性的压力，同时似乎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习惯。就目前而言，部分微信用户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开始重新认识微博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又回流到微博空间来，而传统媒体往往对微博、微信都征用其功能为己服务。这不同的媒体和网络力量，会构造出中国公共领域一个怎样的未来，是值得进行长久关注和研究的。（本文是笔者2014年5月8日至9日应白永瑞教授邀请参加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公共性的危机：社会人文学的挑战与回应”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作者简介：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联系信箱：fengshiyannfc1218@gmail.com）

²⁶ 这部分观点，得益于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网络流行语的李明洁教授的讨论，特此致谢！